

# 七夕的文化底蕴，远不止牛郎织女

■ 叶晨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刘宗迪 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图源：视觉中国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说起七夕，我们就会想到古老的传说。鹊鸟搭桥，夫妻相会。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在七夕节晚上，凡间的女子向天上的织女乞求智慧和持家的技艺，也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夕节也被称为“乞巧节”或“女儿节”。七夕节是怎样形成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乞巧的风俗，是否就包涵了七夕节的所有文化底蕴呢？如果不是，那么七夕节还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茫然：七夕节，不就是这样吗？一个传说而已，它还能有多少“讲究”不成？

很多传统文化沿袭了几千年，发展到现在，可能添加、修改了很多东西，变得丰富或芜杂起来；也有一些，可能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磨损，以至于只剩下微弱的一点传闻。七夕节就属于后者。直到读了刘宗迪的《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我才发现自己原先对七夕的认识有多么浅薄，而在重新认识七夕的过程中，再度燃起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由衷的自豪。

牛郎偷看织女洗澡，藏起她的仙衣，逼迫她嫁给他。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糟粕。可试想一下，如果织女真不想嫁给牛郎，作为天女的她，就真的没有办法吗？这个传说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或许，就像刘宗迪所说的：“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从银河边脉脉相望的两颗明星间，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这是传说打动人心之处，是它被世代传诵的原因所在。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魏晋时期始见记载，但它必定有一个悠长的口头流传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的源头在哪里呢？

刘宗迪大学时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后又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些年来，他致力于民俗学、神话学、口述文学的研究。刘宗迪指出，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异本，但不管故事怎么变化，核心都不变，即牛郎织女七夕会天河，是永远不会变的。因为这些传说原本就旨在解释七夕节的来历，这在民俗学中被称为释源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是为了解释天上两颗星星的由来，所以，也应该从

这两颗星入手，探究牛女故事和七夕风俗的来历。

刘宗迪展示了自己气象学出身的学识素养，围绕着织女星和牵牛星的星象，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时属孟秋，暑热减退，秋气乍起，女人们要纺纱织布，准备寒衣了。在她们头上，有一颗星星总是在黄昏时分高悬夜空，被古人作为七月到来的标志，而七月正是纺织娘开始昼夜劳绩的月份，所以这颗星星就被华夏先民命名为织女。这样的命名，饱含着人间气息和世俗情怀，也是对世间劳苦女子的一丝怜爱。顺着织女星的位置看过去，在它的东南方不远处，还有另一颗明亮的星星，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古人将之冠名为牵牛星，让牵牛和织女化作天上的一对俊男靓女，演绎出一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传说切入，刘宗迪讲述了古人观象授时的学问。28星宿如何成为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恒星坐标系统？牵牛星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又名河鼓？原来，星星被命名为“牵牛”，是因为牵牛象征着牺牲，春夏秋冬，四时轮转，每一次重大祭祀，都要牵牛去祭告天地。牵牛化身河鼓，就成了天上的一员大将，把守着天上的津渡，也等于守卫着人间的风调雨顺，守卫着季节的秩序。

我们现在都说七夕节，但其实，“七

月七日”这个说法，在早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先民在起初都是采用天干地支的纪年法，历法是最初后来才被发明的。传世文献中，最早确凿无疑地出现“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的，当属东汉学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其中记载了七月七日的诸多事务，包括现在还流传着的曝晒书和衣裳以防霉烂生虫，正是合乎时宜之举。这些传说中还包括了魏晋文人郝隆和阮咸的放诞行为、道教麻姑献寿的故事、历代宫廷岁时活动等。在古代，家家乞巧望秋月，七夕节是一个繁盛热闹的节日，文人墨客调风月，留下了无数的诗篇短章。

七夕节的盛况，在宋代到达了巅峰。这与宋代市民文化的流行大有关联。宋代都城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闭的坊市，废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宋代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汴梁的七月七夕盛况中一览无遗。而刘宗迪论述的精确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宋代七夕诸般新生事物中的一样——泥孩儿摩睺罗。这种用土、木、蜡制成的婴孩形泥塑，这种来历不明的外来之物，它为什么不仅在市井间受到追捧，而且竟然还在宋代祖宗的殿堂中登堂入室呢？

刘宗迪追溯此物的来历，从其本身的文字及其所带的异域风味，显然不是传统七夕风俗所固有之物。胡适曾提出，摩睺罗即佛经中的摩睺罗伽，也有学

者指称其为佛经中的另一个人物摩睺罗伽，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说法，总之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刘宗迪寻找出径通幽的线索，发现宋代的摩睺罗与西亚的塔穆兹之间的“遥远的回响”，他还将与弗雷泽的名作《金枝》作比较，探讨广泛存在于亚欧大陆各民族中的、与自然时序密不可分、旨在祈求和促进农作物丰收的增殖巫术及其神话。他在比较中发现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发现犹太教、波斯雨神节等仪式中的文化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它们渐渐融入了中国民俗，成为了华夏本土节日风俗中的一部分。东京汴梁的七夕风俗之所以独具异彩，呈现出浓厚的胡风，正是因为与汴梁的犹太教遗风有关。

波斯文化对于宋代七夕风俗的影响，不仅见于北方的汴梁，也见于东南沿海的粤、闽、浙等地，这是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而发生的。至今，比如广府的七夕摆七娘、祭康王，闽台几郡拜魁星等风俗，都是证明。同时，这也印证了北宋以降，东南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的现象。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魁星主文运，这在中国传统的星官观念中，是一个发明。中国七夕拜魁星的风俗，是从海上而来，源于西亚、北非地区崇拜天狼星的风俗，在我国转化，入乡随俗，落地生根。

七夕风俗在经历了宋代一番惊采绝艳的繁华之后，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再也没有翻出新的花样。其历史进程，与中国经济、文化兴衰沉浮的轨迹，非常吻合。在人们的心目中，七夕的节日情境渐趋于消沉，到如今，往往也只是挂着“中国情人节”的名头，被作为消费主义的噱头。可是，当七夕乞巧的传统风俗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消歇之后，诸如广东的摆七娘、闽台的拜魁星以及陇南的迎巧娘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风俗反而依然存活，这恰恰又提供了一种见证：一种文化，如果历经世变而得以延续，其必定是有着内在的恒久的力量，并且是能够因势利导、因时而动的。

这就是我们重新解读七夕的意义之所在吧。七夕，并不只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所代表的，也是我们文化衍变历程的一个观察切片。

## 宽柔深情，方知幽明之故

——评郭文斌《中国之美》

■ 李航



《中国之美》郭文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问题上阶段性的总结和新的思考。他提出了安详生活观、安全阅读观、底线出版观、祝福性文学观等理念，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讨论。

这部作品是他在《寻找安详》《农历》《吉祥如意》《醒来》之后，对多年来思考的一个梳理和总结。郭文斌如同一位从远古走来的士大夫，他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化律令、习俗规矩挖掘出来，又还原到日常生活的仪规、礼俗与程序之中，将其中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揭示出来，从而让读者领略到中国之美、传统之丰富、文明之润泽，这是我们今日用而在不觉的财富。

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之路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于充沛激情与理想、关注并讨论“人文精神”的80年代文坛，伴随着90年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大众文化的兴起、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等，文学创作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变得空前暧昧与复杂。尽管从宏观层面上而言，现代

性正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但是从微观层面上考察的话，由于自然环境、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社会风貌。郭文斌的故乡宁夏西吉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属于偏远闭塞、经济落后、思想古朴的地区，21世纪初期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潮似乎尚未波及至此，而这也正是郭文斌在现代性语境下具有强烈的传统文自自觉与认同意识的客观因素。

有一位学者曾经问郭文斌，为什么你的文字总是那么安详温暖，是否有意规避现实？郭文斌告诉他，恰恰相反，那正是中国真正的现实，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部正是安详温暖，否则，就无法保持5000多年的生命力。20年来，郭文斌的文字一直在努力向此靠近，而他认为他还远没有表达出

其真正的魅力。

郭文斌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语言，以及驾驭这些语言的高超的技巧，使得他有众多的拥趸。在这本书中，他多处写到节气：“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幽明”的工具化。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日常的生产、生活、祭祀、庆典等等都与节气相关，禁忌、庆祝、劝勉以及许多程序和仪式，都包含着文化的起源、沿革、变迁，这是我们的文明之根，也是我们的发展之源。

人们在文章里找到了内心的吉祥如意，找到了远离喧嚣纷扰的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他的文字和他的思想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浪漫和诗意，如大地一样广袤深厚、雍容包蕴。

懂得了郭文斌，就懂得了中国之美，懂得了中华民族的赓续绵延，也就懂得了生命本身的刚柔相济。

非一味坚硬地堆砌在他的诗歌中，而是意想不到地“软化”了。图尔茨借首尾“物质的最后一块砖石究竟是什么？”和“物质的最后一块砖石只可能是灵魂”，将诗歌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质的思考提升到了哲学层次，认为每一个物质都应当是有灵魂的，非常具有创新性。而《记忆模型》一诗则聚焦于时空概念，表达出对于运动和静止对立关系的思考，将生活中的特定片段进行了提炼。

在图尔茨看来，诗歌就像拉布拉多水晶石，只有拿到手里，以正确的角度放在阳光下，它才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妙色彩。正如他所说，诗歌才是最不可能说谎的东西，我们可以相信：诗歌知道。”



《到清晨我们会老去》[匈牙利]图尔茨·伊什特万 著 余泽民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三味书屋

《中国之美》郭文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年节民俗、乡土伦理、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郭文斌，宽柔、慈敏，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的为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谦卑中有傲岸，安详中有叱咤风云。他用悲悯的目光打量着世界，世界也以慈悲的胸怀拥抱着他。

从散文集《空信封》算来，郭文斌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历30载。此次，他又拿出了沉甸甸的《中国之美》。郭文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痛苦与安详等许多关系做出了深刻的剖析，是他长时间以来在文学、文化

### 好书过眼

《到清晨我们会老去》图尔茨·伊什特万 著 余泽民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只要有手，有光，就会永远有诗

——读图尔茨《到清晨我们会老去》

■ 章子叶

《到清晨我们会老去》是匈牙利诗人图尔茨·伊什特万于2022年出版的诗歌集，荣获2023年度“1573国际诗歌奖”。颁奖词称图尔茨的诗歌“呈现出现代性、革新性、世界性和敏锐擅变的娴熟技巧”，认为“他发出的声音永远不可能被别人所替代”，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而图尔茨·伊什特万也是匈牙利诗歌界一个特殊的存在，正如该书翻译余泽民所说，他不仅仅“是沟通本国与世界诗坛的桥梁，更是连接众人的纽带”。

在《到清晨我们会老去》中，图尔茨·伊什特万沿用了将记忆与对话作为诗歌内核的模式，与古今诗人的诗歌对话，展现出个体对于时空和历史的回味与觉察。在他的诗歌中，读者常常能看到许多熟悉的诗人，并在阅读的同时与这些诗人再次对话。在《诸神的永恒》中，作者通过对荷马及其《奥德赛》情节的再现，展现出他对诗歌、对那段历史的崭新见解。在图尔茨看来，“神话是绝好的添加剂”，荷马正是认识到了神话

的价值，才让它进入文本，焕发出比它本身更耀眼的光芒。而在诗歌中图尔茨也点出，“大多数历史只能存留于他人的言语”，展现了历史和记忆的不稳定性。但结合全文内容，却又侧面写出了有意义的历史会一直以语言的形式被传唱，以记忆的形式留存，跨越时空对话古希腊，借此说明记忆至关重要。同样的写作和思维方式也出现在《特鲁索娃的最后遗言——致库塔格·捷尔吉的音乐》中。在这部作品中，他甚至将捷尔吉的音乐融合到了诗歌中，将歌词镶嵌入诗歌，形成音乐与文学的对话。通过这种形式，图尔茨实现了自身诗歌与其他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融合，创造性地展现出了诗歌的包容性和融合力。

作为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诗人，图尔茨也将语言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诗歌《哲学家入口》中，图尔茨开篇便写道“我写作，我划掉。我站起，我躺下”，仅四个短句，就将“我”的焦躁不安表现了出来。在后文中，他又将“想说什么，

都变得越来越难”单独成段——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说不，只能写下这一句孤零零的话——孤独的文字，是哲学家内心状态的最好诠释。“每一个声响都是一枚沙粒”，哲学家怀揣着他的思想孤独地走在路上，寂静使得每一个声响都尤为突出。作者在言语之间将哲学家的孤独感和使命感相融合，一切情绪皆融入到了作为工具和介质的语言中。而在与诗集同名的诗歌《到清晨我们会老去》中，作者以这一看似不合理的语句为题，展现出了人与时间的激烈斗争，具有加深矛盾的艺术效果，也极富韵味。

图尔茨所书写的，是真正的生活哲学。作为一个感性而又学识渊博的人，图尔茨无时无刻地感知着生活，并在他的文章中增加新元素和新概念。在《第六种夸克》中，他引入了许多科学领域的概念，“夸克”“离子状态”“金属氢”，这些科学概念的引入不仅展现出图尔茨涉猎的广泛，而且用一种新的方式诠释了跨学科写作的意义。同时，科学的概念并



鱼焦了斋读书札记

## 江南古村的浪漫叙事

——读顾艳的长篇小说《荻港村》

■ 陈思和

荻港村是杭嘉湖平原上的一个自然古村落，实有其地。据说在它鼎盛时期曾出过两名状元、50多名进士、200多名太学生和贡生，近现代更是名家辈出，称它为“江南文化第一村”也不算过分。但是顾艳把她的长篇小说取名为《荻港村》，并不是要为古村作传，而是用它做了小说叙事的背景。小说中的地名、文物、甚至有些人也都挪用了真实材料，如第32章写荻港村党支部书记桑果儿准备筹建“荻港名人馆”，便介绍道：“把凡有成就的荻港籍人士全都罗列进去了。譬如：李四光的老师、地质学家章鸿钊，中国民族资本家章宗祥，中国近代史专家章开沅，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先驱邱望湘、陈啸空，外交家章宗祥与瑞典王子罗伯特·章，中国著名矿物学、晶体学家章元龙，‘赤脚财神’朱五楼，中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吴厚贞，以及章氏逆子章宗祥等。”这些被陈列的荻港籍“名人”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实有其人，展示了小说背景的真实性。不过真正被作家采纳到小说情节里的，只有主人公的同学章荣初和归祖寻亲的“瑞典王子”罗伯特·章，而且是花絮性的描述，被一笔带过。真正的小说主人公许长根家族五代人的故事，自成一个虚构的叙事系统。荻港村史上流传着“章百万，吴无数，朱糊涂”的说法，说的是荻港村最大的三个家族和他们的事业命运，而在顾艳的小说里，这三个大家族人民都没有成为小说成员，倒是三姓以外的许氏家族天马行空，完全不受真实性的限制。按照作家的解释，她原来构思是想以海宁许村为写作对象，后来邂逅荻港村，决定把许家的故事搬移了过来。凭借荻港村丰富厚实的文化基因，作家的瑰丽奇幻的想象力就变得有根有须，主人公（也是叙事者）许长根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传奇农民，能诗会画，文武兼修，都能够落到实处。

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特色：没有拘泥于村史的真实性，甚而也放开了对真实历史的时代抒写。作家放纵着浪漫的艺术想象力，以百岁老人许长根对着一只老狗断断续续的回忆为叙述线索，历史风云恰成过眼烟云，人物命运生生死死虚实相间，百年历史事件之即来探之即去——只有选择这样一个角色为叙事人，小说叙述才能打破现实时空，达到举重若轻的境界。假作真时真亦假，我觉得许长根的虚构形象影射了“苍溪渔隐”的荻港精神，把真实与抽象高度结合在一起。他早年投身革命，历尽苦难，又能洞察世情，超凡脱俗。他的弟弟和他的几个儿子都介入了荻港村的权力斗争，各有成败，唯有他自己冷眼旁观，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他的叙述构成了20世纪现代社会的渔樵闲话。与许长根互为呼应的，是他的侄儿许家立。这也是一个另有看点的人物：他是从复仇的“侠”精神逐渐回归隐逸的“道”文化，与许长根早年投身革命到晚年隐逸有异曲同工，合二为一，自成一个叙事视角。如果再往下推及，那就是贯穿小说叙事的小矮人青童，也是长根叙事第二个听众。许长根的这个生命组合让我脑海里突然闪过半个世纪前读过的雨果小说《笑面人》，那里也有一个奇异的生命组合：一个马戏老板，一个瞎女，一条老狼；是他们拯救了“笑面人”，这个生命组合与“笑面人”背后的贵族世界构成完全不同的叙事视角。在《荻港村》里，许长根、青童、侏儒、老狗，还有一头神秘的鹰，鲜明地构成一条民间性浪漫性的叙事线索，与20世纪风云突变的荻港村政治历史形成另类的叙事策略。

不过，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宣扬通世精神的作品，作家也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小说描写许长根的学习和许家立的复仇，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武侠”精神；他们牵黄擎苍、放浪形骸也好，挥金如土、云游天下也好，也都算不上传统意义的“渔隐”精神。小说的叙事时间起始于1918年颇有深意。那正是五四运动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中国人对“远理战胜强权”的信念，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封建帝国意识土崩瓦解，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成为一种世界性因素“物质的最后一块砖石究竟是什么？”和“物质的最后一块砖石只可能是灵魂”，将诗歌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质的思考提升到了哲学层次，认为每一个物质都应当是有灵魂的，非常具有创新性。而《记忆模型》一诗则聚焦于时空概念，表达出对于运动和静止对立关系的思考，将生活中的特定片段进行了提炼。

在图尔茨看来，诗歌就像拉布拉多水晶石，只有拿到手里，以正确的角度放在阳光下，它才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妙色彩。正如他所说，诗歌才是最不可能说谎的东西，我们可以相信：诗歌知道。”

《荻港村》还有一个重要的叙事特点，我称之为“豪华版”的江南民俗大展示。百年习俗路漫漫，叙事者几乎是编年式地讲述江南农村的自然节气、民俗民风，一年复一年的春节家宴、清明祭祖、婚嫁喜庆……而人事却在风俗中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老的一代代萧瑟而去，新一代代茁壮成长，冬去春来，复又是夏炎秋凉，从中推进了时代信息及其演变过程。我原先读过顾艳的很多作品，印象中都偏重于都市江南知识女性的描述以及历史题材的创作，而这次阅读颠覆了我的原来印象，《荻港村》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江南农村史诗式的叙事，除了许长根一家五代的浪漫命运史，小说里还展现了众多贫苦农民的家庭场面：严家辉、庞九斤、高大年、杨鸿庆、独眼龙等等家族的嬗变史，生生死死、子子孙孙，一个细节引出另一个细节，万花筒般地展现一幅幅苦难农民追求翻身、寻找幸福的生活画卷，汇合起来，又揭示出百年江南农村的沧桑之变。

历史需要重温，小说值得细读，细细咀嚼，细细品味，才是阅读这部《荻港村》的最佳方法。《荻港村》创作于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第一版，2024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修订版。2024年1月17日于鱼焦了斋 2024年7月30日修改定稿。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荻港村》顾艳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